



我十八岁，才过門来这里。那年三月間，王来凤帶領一千多人，叫“土擗子”，从青丰县黑墨寨打来，住在刘庄、北張村、野阳。有騎馬的，也有步兵，个个身穿黑上衣沿紅边，头扎黑扎布，編成一营一营，一营有一杆旗，用黑布做的三角旗，上写紅字，不知道是啥字。一下子把中流河包围住了。那时，中流河正修寨，是十八个庄子合伙修的，叫連庄会，中流河是寨主，人都逃到这里，当时都說：“誰想死逃城里，誰想活逃流河。”王来凤包围住中流河，寨还没修齐，把桌子、板凳都垒在寨墙上。打了七天七夜沒有打开。有人編个順口溜，傳开了：“尹自国打的得，王来凤打的硬，霍滩局子不要命。流河寨主王兆福，聞着打仗撓屁股”（按：尹自国即碑記上的尹維新，霍滩在清丰县）。王来凤看打不开了，向寨里喊話：

“你有种就下来，敢下来咱是朋友。”尹老总（即尹維新）說：“下去就下去，英雄不杀使者，你只要不打，咱就交个朋友。”尹老总一人从寨墙上用繩子徐下来，到王来凤帳下，訁和了。村里送給王来凤十四好馬，三头肥猪，几車饅头，算解圍了。

按：“修寨碑記”和“赵杭荣老大娘的回忆”基本相符。“碑記”中的“东匪”，和“回忆”中的“王来凤”是一回事，前者是出地主阶级之口，以辱罵农民起义軍为能事，后者是一般农民往往指名道姓，以起义軍首領的名字为代号。“回忆”中最可貴的是道出了“东匪”的首領姓名和事件的具体情節。

張仲景事迹新考

陈 直

張机所著伤寒論，始見于隋书經籍志著录，仅注云东汉人，极为简单。四庫全书提要則云，机字仲景，南阳人，尝举孝廉，建安中官长沙太守。盖从一貫相承之旧說，其事实他无所見。丁福保《医考》在东汉末期官长沙太守者，人名皆互相銜接，不容有張机官长沙之事。又据后汉书刘表傳云：“长沙太守張羨叛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章怀注，引英雄記曰：“張羨南阳人，先作零陵、桂阳长，甚得江湖民心。”丁氏因疑張羨即張机之一名，云南阳人，云长沙太守，皆与之合。窃謂东汉末期一人有两名，确为常有之事，例如服虔一名祗，荀爽一名詡是也。然張羨之行动，与張机頗不相类，似非一人，丁氏之說，尙值得怀疑。按：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二，引何顒別傳曰：

同郡張仲景总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而詡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又御覽四百四十

关于王来凤起义軍的資料，“碑記”和“回忆”与文献記載也是相符的。《滑县志》云：“（咸丰）十一年岁在辛酉，开州蠹贼卞起元聚众搶掠，入犯滑境。并勾結濮州贼王来凤等，于四月初旬犯滑之山木村、中召、白道口各集，邑令徐振瀛御之而敗。”（卷十二，历代兵事）由此可見，王来凤起义軍是由濮阳西北上，攻打了清丰县的“霍滩局子”。和“黑墨寨”；又西进，于“三月間”兵临內黃县中流河寨下；再轉向东南，于“四月初旬犯滑（县）之山木村、中召、白道口各集”。起义軍的性質，文献記載不多，据《滑县志，东匪紀事》云：“卞起元者，开州蠹贼也。咸丰辛酉（十一年）聚众搶掠，入滑境。先是粵匪于咸丰癸丑（三年），窜扰各省，人心惶惶，奸民乘以窃发。至是，起元勾結濮州贼王来凤等，”云云。（卷二十，叶五）証明，王来凤等是在太平軍北伐的影响下起义的，应是河南捻軍运动的一部分。但在地域上和时间上，以及“回忆”所述起义軍的服飾和旗帜特点上，他与黑旗軍应有密切的关系。据《山东軍兴紀略》云：“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范县再陷……皖匪接迹而渡者踰万，焚掠濮、范、观、朝、开、清、南乐及豫之临、內、浚、滑、淇、汲，千里間皆乱，……廷襄乃檄胜营道員陈显彝，諭劝王来凤及投誠萃教黑旗宋景詩击捻，景詩伪战，来凤故不应也。”（卷十一，土匪三）可見王来凤部与黑旗軍是有一定关系的。

四亦引此文，至本句止）顒先識独覺，言无虛发。王仲宣年十七，尝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痼疾，（原文为門字，今改正。）后年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貫长也，远不治也，后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术，今傳于世。

張机之事实，可考如此。何顒別傳云，应为魏晋时人所作。后汉书党錡何顒傳略云：“顒字伯求，南阳襄乡人，少游学洛阳，顒虽后进，而郭林宗、賈偉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又云：“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顒尝私入洛阳，从（袁）紹計議。”又云：“及党錡解，顒辟三公府，及董卓秉政，逼顒以为长史，托疾不就。乃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会爽薨，顒以他事为卓所系，忧憤而卒。”考第一次党錡事起，在灵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党錡事解，在灵帝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荀爽





参 考 资 料

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情况简介

编者按：李秀成评价问题在全国各地展开讨论，已发表许多文章。为了使读者了解许多作者的基本论点，本刊根据河南历史学会资料组整理的资料，发表这一简介，仅供参考，并希指正。

怎样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是一个长期就存在着争论的问题。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多数同志都基本上肯定李秀成是领导后期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人物，他的《自述》的主要方面是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总结；但也有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李秀成在其《自述》中的种种表示，已经对农民革命事业构成了叛变行为。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提出了重新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的意见。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的摘要，25日，《光明日报》又转载了这篇文章的全文。戚本禹这篇文章的论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作者不同意罗尔纲等人所主张的李秀成伪降说。他认为，李秀成“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是否定不了的”。他在《自述》里不但美化了敌人，还升化了革命，不仅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投降活动。“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它只不过是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之卒，在献帝初平五年。（公元一九四年，即兴平元年。）何颙既为郭林宗之后进，林宗以建宁二年卒，（公元一六九年）年四十岁。（见本传及蔡邕郭有道碑。）假定何颙之年，少于林宗十岁，则何颙当建宁二年为三十岁。又按：三国魏志王粲传，以建安二十二年卒，（公元二一七年）年四十岁。曹植王仲宣诔，亦谓卒于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惟艺文类聚作建安二十三年卒，当为误文。是年正月大疫，王粲盖亦染疫而死者。王粲当生于灵帝光和元帝，（公元一七八年）毫无疑问。综合推断，王粲年十七岁遇见张机时，当为兴平元年。（公元一九四年）何颙既少于郭林宗，王粲又少于张机。上述何颙据郭林宗之卒，当建宁二年，假定为三十岁，张机据王粲之见时十七岁，当兴平元年，亦假定为三十岁。则伤寒论序所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等语。

作者认为，“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产物”。他的“招降十要”“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

作者认为，李秀成“防鬼反为先”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一点并不能洗刷他投降变节的错误。因为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都是革命的敌人，不管是降“妖”防“鬼”或降“鬼”反“妖”，都减轻不了背叛革命的错误。

作者不同意用“历史局限”的观点来为李秀成辩护。作者认为，李秀成“自己放棄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作者认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他在任统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没有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对于下推至建安十年，（公元二零五年）张机当为四十一岁左右。机之卒年不可考，似应在建安末年，甚至至曹魏初期，亦未可知。从王粲年十七岁为兴平元年之正确根据，因可得出张机之相对年龄。

又汉代居延木简中，常见因边郡苦寒，士卒多患伤寒之简文。劳氏居延汉简释文五六三页，有伤寒四物汤药方，为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在张机伤寒论各方中，亦常用此四味，惟乌喙改用附子，名异实同。又同页有“上缺蜀椒四分，桔梗二分，姜二分，桂下缺”之残简文，亦当为治伤寒之方，与伤寒论卷六，乌梅圆方相似。该方共十味，蜀椒姜桂，皆在其中，惟不用桔梗。居延木简绝大部分，皆属于西汉中晚期之物。张机以善治伤寒，称为圣手，知系参用西汉相傳之旧方，加以融会贯通，斟酌损益，遂致集其大成。兹因考张机之事迹，并附论及之。